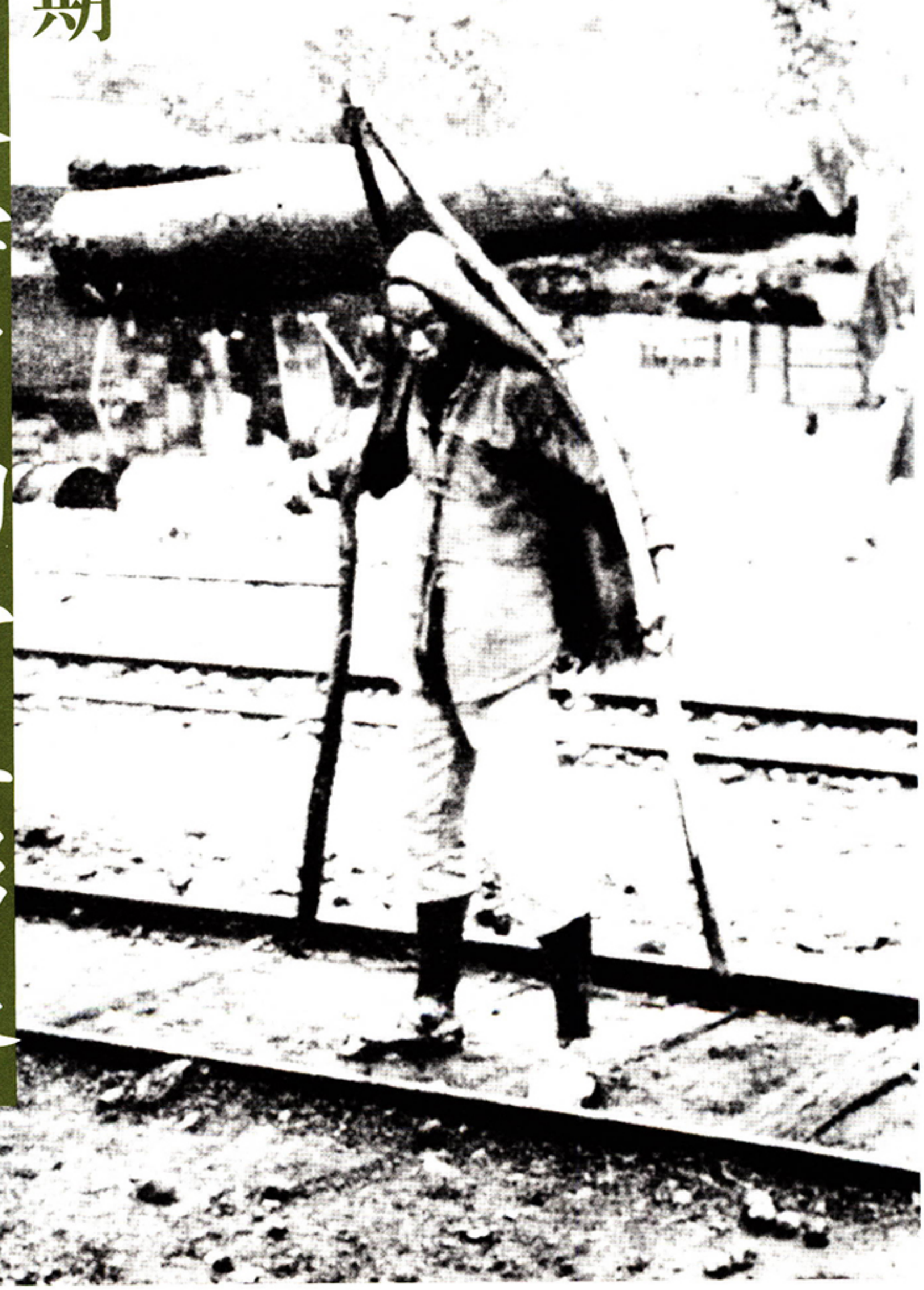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勞工形象

黃慧鳳*



～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為經緯，剖析文學中的勞工問題，從勞動者的受壓迫面談起，再談抗爭改革的可行性，希冀藉由解讀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去追尋勞動者的身影，還原當時勞動者的生活樣貌。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勞工形象

我真不相信農夫們，何以要用汗血換來的穀米來養活著這些不勞而食的人們？我真不相信礦工們，何以要用生命去換鑽石來裝點他那毫不重要的手指？我真不相信工人們，何以要費寶貴的精神織綢緞綾羅來裹那「行尸走肉」的身體？我真不解何以竊人錢袋要受法律的嚴懲，而竊人的生命與幸福卻反逍遙法外…。

~楊華：〈一個勞働者的死〉[1]

日治時期的勞動者是社會結構中的多數族群，這些勞動者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較無法以文學形式來抒發內心的真實底蘊，因此由勞動者自身撰寫的勞工小說與詩歌更是極其有限，但這並不代表勞工文學在日治時期就一片空白，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報刊中，或前些年前衛出版社《台灣作家全集》與遠景出版社《台灣文學全集》蒐羅的日治時期作家作品中，找出不少描寫勞工的文學作品，而這些反應勞工問題的文學作品，總時時流露出現實生活的苦痛，雖然描寫的範圍並非包羅萬象，有時甚至只以勞動者或勞工統稱，但亦包含印刷工人、製糖會社工人、塗工所工人

---

*黃慧鳳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1 楊華本名楊顯達，〈一個勞働者的死〉發表於《台灣文藝》，第2卷2號，1935年2月1日。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薄命》，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14。

、鐵工廠工人、礦工等行業。

就社會形態觀之，日治時期不乏大陸來台工作的華僑[2]，據調查，1898年台北地區的工資較廈門高3~5倍，但生活費用反較廈門低，同時，工資亦高於日本國內。當時對勞工的定義不十分明確，據1904年9月之「清國勞動者取締規則」：「華工係指從事農業、漁業、礦業、土木、建築、製造、搬運、挽車及其他雜役者。」[3]，若據1904年專營華工經紀業務的「台華殖民合資會社」對勞工職業的分類觀之，則包含農、漁、礦、製糕餅工、廚師、裁縫師、司機、織布工、水手、人力車夫、理髮匠等等[4]，甚至包含一些非從事粗重的勞力工作者。由此顯示當時所謂的勞工並非純然是指從事勞役者，因此本文對「勞工」的界定較寬泛，包含封建制度殘留下的傭工、女僕、農工與人力車夫[5]等下層勞動者，因為這些勞工皆是以體力換取工資，與主人(或雇主)有著雇傭關係，故本文將其歸納為勞工。由於日治時期的工業化並非全面開展，封建體制仍殘留，存有不少舊社會的底層勞動者，舉凡牛車夫、長工、下女等，其中部份勞動者亦在社會轉型期成為工人階級，因此本文亦將其納入討論範圍。

殖民地台灣，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扮演著日本殖民母國資本主義的內地延

---

2 日治初期，依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條約批准及換文後兩年內，台、澎住民欲遷出者，可自由處置出售其財產而離去，但限期屆滿未遷出者，則宜視為日本臣民。因此於限期內未離去者，則視「日本帝國臣民」，日人以「本島人」稱之，以別於日人，限期屆滿後再返台但未申報願為日本臣民者，以及1895年5月8日以後始自中國大陸來台者，均被總督府視為外國人之一，日人以「清國人」、「支那人」稱之，俗稱「華僑」。詳參吳文星，《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學生書局，台北，1991年3月初版，頁1-2。

3 台灣總督府「日本統治下の民族運動」上卷，頁690~691。松尾弘『台灣と支那人勞動者』南支南洋研究第28號(台北，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支南洋經濟研究會，1937)附錄二：關係法令集，頁118。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日期在台「華僑」研究》，同前引，頁1-2。

4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同前引，頁1-41。

5 因為農工多屬季節性的工人，在農餘之暇或工廠需工人時成為工廠主的短期雇傭，而人力車夫與載客主之間亦屬短期的雇傭關係，故本論文將其歸納為勞工。

長角色。這種延長角色是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具體表現出來。也許可以說正是資本主義「基於疆域之分工所開創出來的國家空間之分化」[6]，利用台灣低價勞工與高溫多雨的自然條件，推動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生產。然而侵華戰爭發生後，台灣的地位開始有顯著的變化。為了因應非常時局，殖民地政府小林總督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宣佈治理台灣的三大政策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7]就工業化而言，台灣從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殖民地社會，轉變成為重工業社會，日本許多重要的軍事需要都有賴台灣供應，因此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扭曲，以及精神抵抗的萎縮，也都在這段時期有了明顯的體現。

在論述架構上，本文將以日治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為經緯，剖析勞工小說及詩歌所呈顯的勞工問題，從勞動者的受壓迫面談起，再談抗爭改革的可行性，希冀藉由解讀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去追尋勞動者的身影，還原當時勞動者的生活樣貌。

縱觀現存的日治時期《台灣青年》(1920)創刊到《福爾摩沙》(1932)、《南音》（1932）、《第一線》、《先發部隊》（1933）、《台灣文藝》（1934）、《台灣新文學》（1935）等文學雜誌，我們知道台灣作家們已隨文協的文化啟蒙運動，由武裝抗日改為文化抗日，作家們團結起來，力謀文化的提昇，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傳統。許多知識分子參與文化協會[8]

---

6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1984) P146.轉引自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立緒出版，2001年1月初版一刷，台北，頁420。

7 1939年5月19日，當時小林躋造總督於東京的途中，在記者招待會上鼓吹台灣的三大政策是：「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大政。直至他被調離崗位，始終高唱此三大政策。轉引自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第二章第四節〈軍需「工業化」的起步〉，人間出版，台北，頁139~153。

8 台灣文化協會1921年1月17於台北市靜修女子學校成立，宗旨：「助長台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以知識份子集合民眾，透過文化化活動啟迪民智，喚醒與統治者對抗的覺醒，鼓舞民族自信心，激

，參與全島文藝者大會及台灣文藝聯盟[9]，並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以作品真實的記錄下了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諸多面向。

小說因重人物刻畫、情節的鋪陳架構以及場景運用等，尤能表現出日治時期底層勞動者的生活樣態。這些小說在主題上分別呈現出封建制度殘餘下的奴僕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入侵後，社會轉型期的勞工問題以及日本殖民體制對台灣下層勞動者的施暴。小說中可見本土封建地主對下層奴僕的欺凌，以及日本統治者對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對待，不管在政治或經濟層面都在在顯示出勞工生活的困苦。至於詩歌方面，屬勞工範疇的寫實作品較少，但仍有林克夫〈失業的時代〉(1931)、楊華〈女工悲曲〉(1932)、吳新榮〈煙囪〉(1935)、楊守愚〈人力車夫的叫喊〉(1930)、〈一作車夫〉、〈女性悲曲〉、〈長工歌〉、楊少民〈餓〉等，以及赤色救援會秘密油印以台灣話寫作的《二字集》、《三字集》[10]詩歌，反映出工人及全體被壓迫的台灣人的心聲與處境。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推演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勞工的幾類形象，茲分析如下：

一、封建殘餘的奴僕

根據涂照彥的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特徵，「一方面傳統的社會經濟

發民族意識。活動內容包含發刊會報、設置讀報社、舉辦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舉辦定期巡迴演講、號召「無力者大會」、提倡文化劇團等。參與人約1200人，可謂知識份子傾巢而出。

9 1934年5月6日於台中舉行全島性第一次文藝大會，同年11月5日組織「台灣文藝聯盟」參與者包含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張深切等鹽分地帶作家，據賴明弘回憶，在第一次台灣文藝大會邀請出席的名單中，共有94名，但亦有出席卻未在名單者。其後結合左右翼全島大團結，並於1935年6月成立佳里支部，參與者包含吳新榮、郭水潭等。參見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明潭出版社，台北，1979年3月，頁378-391。

10 參見楊碧川，《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稻鄉出版社，1996年6月再版，頁263-270。

結構被保留、利用，但本地資本勢力仍在日益衰退，另一方面在單一作物的生產形態下，被強力推行資本主義化，使本地社會經濟深深地被資本主義合理滲透。因而台灣殖民地經濟的一大特徵是，既繼承了歷史上發展下來的前期性商品經濟，又使立足於這一基礎的台灣本地資本勢力在殖民地化的進展中衰落。」[11] 因此傳統封建結構仍殘留，只是封建主人的經濟地位(除勾結官廳的買辦者外)逐漸降低。就日治時期私人主佃封建結構而言，土地可以買賣，地主經由封建地租和勞役對佃農進行剝削，形成主奴的二元對立，產生階級壓迫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此外由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同時存在著中央集權式的國家權力壓迫。

在描寫封建地主家庭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窺見建立在雇傭形式下的長工、短工與女僕是無人身自由的，女僕因處在性政治的劣勢下，如物品般被變賣與轉嫁，所受的壓迫更深。呂赫若〈財子壽〉[12] (1942)中，描寫沒落封建家庭「福壽堂」的敗德史，在歷代的封建主人中，不管是英雄式的周九舍或破落分家後的周海文，皆是擁有大宅院與三妻四妾的主人，有著數位供其使喚的長工與婢女。小說中長工溪河代表的是忠心的奴僕，儘管看不慣許多背德之事，仍默默不語，因此始終無法改變任何現狀。而下女秋香、素珠等人雖與主人有染，受寵一時，卻仍逃脫不了被逐出宅院轉嫁他人的命運。

灰(賴和)〈未來的希望〉[13] 中的阮大舍是「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主人，以傳宗接代之名，視「妻子如衣服，再換一個，較會生育也不一定

---

11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版，台北，頁527。

12 呂赫若〈財子壽〉《台灣文學》2卷2期，1942年3月10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牛車》，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45-85。

13 灰(賴和)〈未來的希望〉，出版年不詳。轉引自《賴和全集》(一)小說卷，前衛出版社，2000年6月，台北，頁227-285。

」，強調後嗣的重要，因此陸續娶了一房正妻和幾房側室，且將「家政世務」全歸他的「使用人」(即佣人)辦理。而這裡的家政世務中隱含著性勞動，婢女自是包含其中。小說中正妻與側室都未產下一子，反倒是陪嫁來的婢女為阮大舍生下了唯一的子嗣，在欣喜之時，卻因男嬰水腫恐有弱智之餘，而百感交集。然而不管阮大舍的希望是否能實現，肯定的是未來仍舊將有性奴僕遭阮大舍蹂躪。

下女的處境在龍瑛宗〈一個女人的記錄〉[14](1942)中亦可窺出端倪。女主角的出生與其他窮苦女孩的出生一樣是不被祝福的，自出生即因生理的女性性別倍受差別對待。在賣女的合理化風氣下，十三歲那一年被賣予街上富裕的地主林家，戶籍上寫的雖是「養女」，然而實質的身份則與下女等同。正如日治時期陳如江氏的批評：「嘗見蓄婢之人，托養女之名，以牛馬相待者有之，以奸淫相加者有之，昨日賣一婢，今日買一婢，至顏色老矣，終身苟活，不得為夫妻子母之樂，不得依祖宗墳墓之鄉，生而絕嗣，死而絕社，天下人類之最慘者，曷嘗有如是之甚哉！」[15]由此可見封建社會「養女」一詞的欺罔性，在封建父權體制下，「養女」這一符徵，已被指涉為「下女」這一符旨。而生命的貴賤也在販賣的行為中充分體現，〈一個女人的記錄〉的女主角十八歲那年遭林家主人凌辱懷孕後，再度二手被踐賣給另一個男人，但生活依舊貧賤，丈夫又以封建社會思維來重施故技，決心賣掉女兒。小說中的女主角並沒有名字，僅以「一個女人」的身分出現，正象徵著所有相同處境的女性。

---

14 龍瑛宗〈一個女人的記錄〉，張良澤譯，《台灣鐵道》第364號，1942年10月。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165-186。

15 見《崇文社文集》卷二。轉引自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台北，頁349。

類似的情形在楊雲萍〈秋菊的半生〉[16](1928)中亦有所著墨。在金錢往復的場景中，秋菊的父親默默地檢收鈔票，而秋菊和她的母親則在一旁唏噓地啜泣。隨即秋菊的生命與身體亦陷入龍瑛宗〈一個女人的記錄〉同樣的陷阱。[17]當男人在快樂享受與數鈔票時，女人卻在一旁互相哭泣、漫罵。由此觀之，在父權體制的封建社會，女人不僅是嫁給男人，更是附屬於男人的財產，是男人的物品，在家務與性勞動裡成為替男人工作的奴僕！在吳希聖〈豚〉(1934)中即明白的寫到，在那樣的年代「農人的財產已經不是田園和山地。這些都是毫無益處的『裝飾』，只會白白吃掉肥料。重要的只有女兒和豚。女兒會『生』錢，豚會變成錢。」[18]女主角阿秀因為是「查某」(即女性)，與豚一樣可以轉手賣錢，以每月二十塊被賣給有錢的保正進財伯當「細姨」，因而被父親阿三視為有價值的物品。

當欺壓底層女性者包含女性同胞時，其嘲諷性更是顯而易見。變賣女人者不乏女人，如媒介者，或生之、養之的母親，她們不知不覺的內化女人命賤的思維，不斷重覆封建社會窮人改善生活的模式。張文環〈藝旦之家〉(1941)的養母即在經濟利益的共犯結構中成為協力的一員，為了賺取優厚的償金變賣養女采雲。賴和〈可憐她死了〉[19](1931)中，阿金是窮苦勞動者家庭中的女兒，經由阿狗嫂仲介被母親賣給阿跨仔官當「媳婦仔」(即養女、童養媳

16 楊雲萍〈秋菊的半生〉《台灣民報》第217號，1928年7月15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183-189。

17 郭議員趁妻子搭人力車去城隍廟那一天，佯裝頭痛留在家裡，要秋菊倒一杯茶來，待秋菊端上茶入到郭議員的房裏時，郭議員竟忽把門閂住，使秋菊不知所措地驚惶起來…，待郭太太得知此事，則無限憤恨地痛哭罵著「你這婊子！你，你這賤人，十娼！死，死狗母還要，還要…」。

18 吳希聖〈豚〉原載於《福爾摩沙》第三期，1934年6月15日。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豚》，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3-25。

19 賴和〈可憐她死了〉《台灣新民報》第363、367號，1931年5月9、16、23、30，6月6日。現存於《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1日。

)，本以為阿跨仔官人慈祥、家境較好，豈料阿跨仔官的丈夫與兒子都在工廠罷工風潮中相繼死去，阿跨仔官便在阿狗嫂的勸說下再度轉賣阿金。阿金在二度轉賣給富戶阿力哥後懷了身孕，又再度以一百圓被賣回給阿跨仔官。最後懷著身孕仍得勞動的阿金，在河邊洗衣落水淹死，才結束了她一生被販售的命運。

綜觀之，男主人在小說中大多愛拈花惹草、貪圖女色，喜好吃阿片(鴉片)，女僕「幸運」的話或納為妾享受榮華富貴，其餘則多半再三轉手給其他男人。女人正如物品，可任人輪替使用。在封建社會，這樣的命運彷彿會遺傳至下一代，窮苦人家依舊賣自己的女兒以維持一時之生計，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著。這讓人想起盧卡奇所提的「物化」，長工與女僕是有錢人家的生產工具，自踏進主人家的那一刻，便已賣身、賣自由了。女僕是被物化的性商品，不僅可以使用之，更可以二手甚至三手轉賣，甚至販至妓女戶充分販售，將女性的「物性」發揮極致，再從中剝削暴利。

在男性權力主導一切的封建社會中，不僅存在著男性沙文主義對女性的壓迫，大戶人家的女主人亦會欺負下層女僕，女僕間亦會相互爭寵，甚至女僕亦可能欺負羸弱的女主人，如此女人將永遠無法擺脫附屬於男性的社會地位。這令人想起動物世界弱肉強食的情形，若受壓迫的底層弱勢群體不能團結合作，將只有不斷被強者鯨吞蠶食。日治時期社會雖然在進步改變，但封建體制並未完全死滅，仍留有封建思維，羸弱受苦的奴僕們便成為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來成就主人的權威。然而亦由於奴僕們缺乏自覺意識，階級意識並未完全覺醒，因此總是在強權者籠罩的烈日下，過著奴僕的生活，彼此爭奪，卻不知真正要反抗的實是那一手遮天的主人，真正要改變的是社會傳統的封建思維。

二、社會轉型期的勞工

就日本殖民者而言，台灣是位處日本南方的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正如西川滿的老師吉江喬松鼓勵西川滿返回台灣為地方主義奉獻一生所書贈的一首詩：「南方是/光之源/給我們/歡喜與/華麗」[20]。從經濟地理學來考量，位處亞熱帶的台灣，有豐富資源可提供日本宗主國。在政治、經濟等統治措施中，殖民政府引進資本主義，強調科學、文明、現代化等方針，逐漸改變了台島的原有社會型態，許多勞動者不得不面臨農業到工業的轉型過渡。這樣的社會現象正反映在1920、30年代的文學作品，其中最為突顯的議題是失去土地的農工，以及在現代化指針中機器生產下的工人。

(一)、失去土地的農工

日本現化製糖業的引進，取代了本地經營的舊式糖廠、糖間，且由於現代化製糖廠的需要，逐步收購農民土地。[21]沒有了土地，農人做工兼作農，成了他人土地上的奴僕，雖常年受雇為農業工人，仍以農業為正業，只是利用剩餘勞動時間至糖廠工作，過著低薪的農奴式生活。1926年製糖會社開始大規模的進行土地兼併與沒收，農村生活日益困苦。1929年發生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更加剝削，生長在台灣的作家不免受到波及。作家蔡秋桐身兼製糖會社原料委員，所以更加了解蔗農的生活，因此在他的小說中對於殖民地農村生活有著敏銳的筆觸。在蔡秋桐〈放屎百姓〉[22](1931)

---

20 轉引自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7)--皇民化運動下的四0年代文學〉，《聯合文學》，187期，2000年5月，頁158。

21 1913年前後開始積極收購土地，但因本地人對土地的執著，總用了總督府、地方官廳勢力以及警察權力來強制執行。有關日治時期現代製糖業對台灣的滲透，參見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版，台北。

22 蔡秋桐〈放屎百姓〉《台灣新民報》第361、362號。下篇遺失，1931年4月25日、5月2日。現收

中，我們看到了與製糖會社一樣剝削人民的半官方組織「K組合」(K組織)，強行收購發哥的祖田，在淫威下農民只有乖乖順從，農也做，商也做，工也做，但還是「逐日得不到三頓飽」。相同的情形發生在蔡秋桐〈四兩仔土〉(1936)的蔗農土哥上，本有土地的土哥遭受官廳私心壓迫，平白無故的被糖業會社強制收買父親遺留下的厝地，賣三甲地來買五分田，從中上層階級降為中下層階級，只好每日做工兼做田，靠苦力賺三角半養活自己和母親，淪落到領補助金的窘困地步。荒謬的是，補助金二圓五角竟有兩圓是要納租稅的，如此荒謬的社會現象，正披露了日本殖民時期的特異現象。

在守愚(楊松茂)〈凶年不免於死亡〉[23](1929)與楊逵的〈送報伕〉(1934)中，對於製糖會社的剝削亦有著透澈的呈現及強力的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在謀取台灣蔗糖經濟資源的首要考量下，農人已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勞動者，自身的勞動也不再只是為了求得個人溫飽。

然而到城市去發展卻也不見得美好。林越峰〈到城市去〉[24](1934)中，忘八本為佃農，與地主爭執後到城市找工作，阿四因要到南洋開礦便將洋車賣給他，然而做生意卻遇到只賞二個銅片的王老爹，便又改行擦鞋，最後淪到去偷的歧途。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與台灣經濟的轉型期，似乎不論城市或鄉村都找不到好出路。

日本蔗糖事業專斷的收購土地，使勞動者失去了世代賴以維生的田地，沒有了土地，勞動者成了為他人工作的農工，個人勞力所得不再是直接需求的

錄於張恒豪主編：《台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2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前衛出版，台北，1991年2月1日。

23 守愚本名楊松茂，多以楊守愚為筆名寫作。〈凶年不免於死亡〉《台灣民報》第257-259號。1929年4月21、28日、5月5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群失業的人》，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3-12。

24 林越峰〈到城市去〉原載《台灣文藝》創刊號，1934年11月5日出版。轉引自《台灣作家全集-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1日初版，頁207-220。

物品，反而是不足以飽食的薪資。而這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由不費力氣的資本家取得。楊華〈黑潮集〉第四十九首中對金錢有如此描述[25]：「鏡有破時/花有落時/月有缺時/銀幣卻保持著永遠的勝利。」而資本家正為了取得勝利的銀幣，不惜犧牲勞工，無怪乎勞動者對資本家怨恨。吳新榮〈煙囪〉(1395)一詩，寫出勞工對製糖會社的無奈與不滿：「...這白色屋頂下/資本家嗤嗤而笑/這黑色煙囪上/喘出勞動者的嘆息/啊，榨出甘甜的甘蔗汁/流出腥腥的人間血/於是煤煙與砂塵染遍了/陰慘色的平原/沉悶了天空...不久結帳的日子來到了/煙囪底下聚集的黑影/人人手裏兩張白紙/『領狀證』與『借用證』的金額/不平又奈何/哀嘆的妻子/挨餓的孩子/指著這白圭的高塔吧/白色的屋宇是枉死域/黑色的煙囪是怨恨的標的」[26]正如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所說：「甘蔗糖業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27]造成無數台灣勞動者共同的痛苦歷史記憶。

(二)、機器生產下的勞工

牛車聲音、牛車夫的身影，今日已不可多聞，若真要尋找，恐怕要至鄉間或博物館才能一訪思古之幽情。隨著現代化的開展，牛車已逐漸被人力車、自動車取代。這令人聯想到邱炳南撰寫的散文詩〈廢港〉(1939)，描寫台南古城不同往昔的風貌，牛車已漸漸成為歷史遺跡：「牛車。澄清的蒼穹鈴響遠離了。車塵的味道，終成你的容貌，在朱櫟下啜泣。」[28]

---

25 楊華〈黑潮集〉第49首，原載於《台灣新文學》第2卷第2、3號，1937年1月31日、3月6日出版。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102-103。

26 吳新榮〈煙囪〉原載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八、九號，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出版，張良澤譯。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135-136。

27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帕米爾書店，台北，198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189。

28 邱炳南〈廢港〉原載於《華麗島詩刊》創刊號，1939年12月1日。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望鄉》，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189-192。

呂赫若〈牛車〉(1935)一文的時空舞台是在1930年代，社會經濟普遍不景氣。楊添丁原本是以牛車替人運貨營生的工人，但在日人引進汽車後，牛車載貨的競爭力敵不過現代化機器設備，導致牛車夫的生活陷入困境。自動車係機械化的謀生工具，其快速與省力等優勢取代了傳統牛車，縱使楊添丁比以前更努力工作，載貨的機會反而更少。楊添丁之妻阿梅原屬封建社會的家務勞動者，在邁向現代化的社會裏，亦走出家門到工廠工作。這是社會時代變遷造成的結果，楊添丁深受其害亦明白箇中道理，以往牛車行走在危險狹小的保甲道上，足以使口袋不缺錢；如今「那到底趕不上走得快的運貨汽車和腳踏貨車呀。」[29] 在工業化改革下，我們驚見現代化的風潮襲捲全台，人的勞動生產力已大不如機械生產力，因此牛車夫的工作被取代似乎是不可逆反的命運。

於此日治時期街頭巷尾的文化，已不再是緩慢的閒情步調，而是世態炎涼的冷熱交織。同樣的楊守愚〈人力車夫的叫喊〉(1930)一詩中，人力車夫出盡了牛馬的力氣，拉麻了雙手，跑瘦了雙腿，仍不敵自動車的優勢：「科學的發達，/容不得些兒抵禦，/手工業的淪滅，也是必然的趨勢。」[30] 生產工具的改變，使牛車及人力車不敵機械化的自動車，而牛車夫與人力車夫等少了科學機械的優勢，也就成了現代化社會被淘汰的落後子民，陷入了達爾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生存規則中。文本悲劇式的結局彷彿是整個大社會的縮影，不禁令人質疑，現代化的聲浪對底層勞動者帶來的是更美好的生活？還是普遍的失業？反思當時殖民者開展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運動，所謂先進文明的道路，彷彿正是以科學、理性、現代化的藉口來運作。

---

29 胡風譯，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前衛出版社，台北，1994年11月版第四刷，頁122。

30 楊守愚(楊松茂)〈人力車夫的叫喊〉《台灣新民報》第338號，1930年11月8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24-227。

廢人(鄭明)的〈三更半暝〉(1926)，主要是刻畫運轉手(司機)枝材的生活，在便捷等優勢下，載客量多，乘座者又較為有錢，因此工作量亦較其他人力車夫大，比起其他空有力氣在身，卻無工作可做的人來說，彷彿是比較幸福的。但從工時的角度觀之，工時長、工作量大，還得隨時待命不分晝夜，卻也仍然不得溫飽。這樣的結果有其社會源由，正是本土地主匏仔舍協助官廳獨占道路造成[31]：「自從把這群苦力的飯碗推倒後，一個運轉手當十個苦力，四台客車，三台貨運車，日夜兼行。不久，果然把匏仔舍眠床後一金庫塞得全銀票滿滿。」[32]因此縱使生產工具的改變造成勞動者謀生方式的轉變，卻不能單純歸罪於歷史進程的現代化趨勢[33]，忽略了本土資本家與官廳勾結對人民造成的傷害，甚至是資本家輕賤工人生命的態度。在克夫(林金田)〈阿枝的故事〉(1931)一文中，如此描述：「工人是永遠不會死完的……所以報紙雖然天天在報導著工人的死傷，然而工人卻永遠不曾缺額過，機械也照常地大恣淫威在轔隆怪叫，資本家也正因此樂得不用顧慮到危險與否的這一件事情上面。」[34]這些政治統治者及資本家等既得利益者，互相勾結，形成欺壓勞動者

---

31 類似情形可在〈為開道路費用不足-強制多徵保甲費〉一文得到更深入的了解，詳見《台灣民報》第131號1926年11月14日。

32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第一卷十號，1926年10月10日。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送報伕》，遠景出版社，1997年7月三版，台北，頁391－417。

33 台灣工業發展形態 (1914~1931年)

項目	1914	1920	1929	1931
工場數額(所)	1,309	2,695	5,870	6,094
平均每一工廠工人數(人)	18.2	19.8	12.1	9.5
使用動力工廠比率(%)	44.5	41.5	66.1	73.1
平均每一工廠使用動力台數	-	0.64	0.93	0.99

就1914至1931年台灣工業的發展狀態表來看，1914年使用動力的工廠為44.5%，1929年為66.1%，1931年增加為73.1%，可見機械逐漸代替人力的明顯數據。資料來源：張宗漢，《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社，1980年5月，台北，頁28。

34 克夫(林金田)，〈阿枝的故事〉，《台灣新民報》，第384-6號。1931年(昭和六年)10月3、10、17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豚》，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9-38。

的共犯結構，以上位階級中心主體，行使獨占道路的空間支配權，利用機械來精簡人力成本。肉體的勞動是要休息的，不如可以永恒運轉的機械，因此生產力自比不上機械生產力，在現代化生產的運作政策中，機械代替人力除能提升工場生產力外，應能減輕勞動者的工作，但太過精簡人力的措施，卻造成部份工人的工作更為煩重，而部份工人又遭逢失業的命運。小說中許多工人便如楊華〈一個勞働者的死〉的施君一樣命運乖舛，因過度勞動而身體孱弱，終將生命獻祭於冰冷的機械。殘忍的是，資本家自身衣食無缺卻無視勞動者的挨餓受凍，仍以求取生產的最大利潤為前提壓榨勞動者以體力勞動工作的剩餘價值，徒使勞動者在隆隆的機械聲中掩面哭泣。

三、殖民體制與勞動者

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的勞動者不僅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更無法擺脫殖民主義的荼毒。以楊華〈黑潮集〉第五0首詩觀之[35]，勞動者的生命一如沙漠中的塵沙，已無奔放的生命力，只能在社會中無止息的流浪，尋覓下一個期望飽食的工作。在殖民者同化政策的表象內，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實禁不起驗證，日台勞工待遇相差懸殊，在同化政策的糖衣包裹下，實有著無限的苦楚。一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言：「倘若殖民者的野心是知曉，是吸收同化，是統治，那麼，我們就應該時刻牢記，對於被殖民、被奴役、被束縛在契約之上的人民來說，即便真有人就殖民過程應如何實行向他們諮詢過，那真實的情況也是迥然不同的—與殖民者的法庭、市政廳和圖書

35「命運！/是生命的沙漠上的一陣狂飆，/毫不憐恤的/把我們/---不由自主的無量數的小砂---/緊緊吹揚鼓蕩著，/飄飄地浮懸在空虛裏，/飄浮飄浮永沒有止息之處。」參見楊華〈黑潮集〉第50首，原載於《台灣新文學》第2卷第2、3號，1937年1月31日、3月6日出版。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103。

館等所描述的情況都會相去甚遠。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告訴我們，對於許多人來說，帝國主義就意味著家破人亡，意味著被剝奪和貧困艱難的生活狀況，它決不僅僅是一種象徵、理念或愛國情感層面上的事情。」[36]

(一)、日台差別待遇

日治時期台灣同胞與日本人的工作分配是極其不同的，上階層有決策權的工作絕大部分是內地日本人才能擔任的。總督府對於本島人的任用較偏重財富、家世及其合作的程度，導致過去士紳階級的社會主導地位逐漸被富豪及與總督府合作者取代。同時由於殖民行政體系延伸至基層，本島人可擔任參事、區街庄長、保正、甲長等職，雖仍如清代扮演著官民之間的橋樑，但已喪失對地方事務的決策和影響力，只是遂行殖民行政任務的輔助工具。[37]

在工資及待遇方面，即使本地人與內地人擔任同一份工作也同工不同酬。鄭登山〈恭喜〉(1928) 中，主角失業成為「生產的後備軍」，作了短短三十天的臨時郵差，就同擔任郵差一職來看，日台薪資就明顯差了六元，工作待遇亦不同：「日本人分擔的是城內，道路好區域小而容易配達；台灣人分擔的是蹈艋，道路壞區域大而難於遞送。」[38]王萬得在〈六一七案公判〉(1926) 中提及：「在新營、淡水、台北郵便局勤務的數年間，受了種種的差別、無上的侮辱，竟釀成我一種反抗心。」[39]就1931年的統計史料觀之，台灣勞工工資低於在日本勞工工資，日本人來台者並未降其工資，大體與日本本國水準相同，然而台灣本省人的工資，與台灣日本人的工資則有著歧視性的待遇。

---

36 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著，盛寧、韓敏中譯，（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遼寧，頁21。

37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教育部大學聯合出版委員會出版，正中書局印行，1992年7月台初版第二次印行，台北，頁370-377。

38 鄭登山，〈恭喜〉，《台灣民報》，1928年1月1日，189號。

39 〈六一七案公判〉《台灣民報》第117號，1926年8月8日。

據1931年台北市日工工資統計資料來看，鍛冶工、木工、水泥工、排字工、製糖工、臨時工等本省人的工資，佔日本人工資的百分比分別為：48%、57%、57%、72%、55%、69% [40]，由此可見台灣勞工與日本勞工的薪資有一定比率上的差異，而且部份低層工作(如水田農工、造罐頭工等)皆是由台灣勞工來做。因此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表面上似乎是日台親善、日台平等，但實際上則是不平等的延長。

王詩琅〈十字路〉(1936)中，我們清楚看見日台不平等的狀況 [41] 是教育也改變不了的宿命 [42]。正如1926年6月《台灣民報》一百八號的社說〈台灣人材登用究竟還是口頭禪〉所載，即使是小使的採用，卻也是內地人居多 [43]，因此就算本島人與內地人具有同樣的教育程度，內地人還是較有工作保障權。朱點人〈脫穎〉(1936)中，陳三貴十五歲那年以優等成績於公學校畢業，被雇用去官衙當永不升級的「萬年給仕」，終日任犬養主任使喚。但滿洲戰役(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犬養主任的獨子戰死，犬養主任竟希望女兒敏子與本島人結婚，因為當時日本女孩嫁內地人，生子是要當兵的(當時台灣志願兵尚未實施

40 表一：台北市日工工資統計(1931年) 單位：台圓

工別	鍛冶工	木工	水泥工	排字工	製糖工	造罐頭工	水田農夫男工	臨時工
日本人	2.50 (1928)	3.00	3.50	2.50 (1930)	2.50	-	-	1.30
本省人	1.20	1.70	2.00	1.80	1.39	1.30	1.20	0.90
本省人工資佔日本人工資百分數	48%	57%	57%	72%	55%	-	-	69%

張宗漢，《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社，1980年5月，台北，頁44-45。

41 小說中張坤源公學校畢業後即到銀行任給仕(工友)，一心想飛黃騰達，其後雖考上文官，但卻仍擔任下級行員，無法榮達。

42 教育方面，日本在台實行精英教育，中上階層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實遠大於一般下層勞動者，且日台教育機會不均，1943年受高等教育的台籍人數只占台灣的0.04%。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教育部大學聯合出版委員會出版，正中書局印行，1992年7月台初版第二次印行，台北，頁114。

43 參見〈台灣人材登用究竟還是口頭禪〉《台灣民報》一百八號社說，1926年6月6日。

)，在戰爭時局裏日本男人極可能戰死沙場，但「若嫁台人生子免做兵」[44]，所以犬養主任希望自己的女兒可以嫁台灣人，但條件是要入贅犬養家。長久以來，朝思夢想成為內地人又暗戀敏子的三貴，便順勢成為「犬養三貴」。在獲得身份改變後，三貴由給仕鹹魚翻身成為事務員，亦自以內地人的身份自居。其行徑與王昶雄〈奔流〉[45](1943)的伊東春生相同，藉聯姻來擺脫本島人永無翻身的低下生活，彷彿台灣底層勞動者唯有變節成為日本人，才得以改變現狀。然而三貴如此的歸化行徑，在朱點人命名為「犬養」二字的姓氏裏，已隱含著充分的批判性，亦披露出當時日本殖民者要台灣人數典忘祖，做日本順民的社會現象。

然而台灣勞工並不是都如犬養三貴一樣，在殖民者日優、台劣的二元論述思維下認同日本的權力位階，不惜放棄自身的血源種性歸化為內地人。王詩琅〈十字路〉中，工友張坤源的同事定秋與其表弟萬發，都是懷著理想，力圖改變現狀的共產黨員，他們奮不顧身的為無產階級奔走，雖然被檢舉而入獄，但比起主角張坤源，雖也有點理想卻不敢行動，最後心情苦悶，淪落到聲色場所買醉放縱來的有意義多。

綜言之，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是夾帶著薩伊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的優越論進入台島的。不僅有著上位的權威，也夾帶了種族的歧視。為了要控制本地的土著社會，日本總督府實行嚴刑峻法的警察政治，來治理教化殖民者眼中低下的台島人。

(二)、警察政治

44 朱點人，〈脫穎〉，《台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1936年12月。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薄命》，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147。

45 王昶雄〈奔流〉原載於《台灣文學》第3卷第2號，1943年7月31日。參見鐘肇政譯，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前衛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四刷，台北，頁357~394。

日本統治台灣時有許多新建設的措施，警察便是推動政令的指揮者，角色可謂舉足輕重，人民總以「大人」稱之，除了敬重之外，是帶有畏懼感的。警察問題也成了當時小說的共同主題[46]，張恆豪曾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一言以蔽之，便是警察政治的徹底運用。」[47]當時警察的淫威可謂踐踏台島各地，濫用刑事職權，連地方保甲、保正亦不例外的受欺凌[48]。孤峰〈流氓〉[49](1931)中印刷場的阿B失業後想賣冰，但許可證屢被日廳拖延、阻擾，於是只好改賣仙草，卻又被警察開罰單。楊守愚〈瑞生〉[50](1932)的主角瑞生，原是祝生會的外務，失業後經鄰人介紹至鄉下X產業道路做工，一介文弱書生只做了一天半的工便病倒，改行賣雜貨生意稍有起色，卻又遭受警察大人的盤檢，終究無法改變窮困的窘境。呂赫若〈牛車〉中，楊添丁好不容易工作十天賺了八十五錢，因生意清淡，坐在車上正打瞌睡時，大人突然來臨，幾句「不准坐在車上，不曉得嗎？」、「混蛋，支那豬！」的被鄙夷咒罵後，隨即牌照被寫了去，十天賺的八十五錢，竟不及付一日的二圓罰款。賴和在〈一桿秤仔〉(1926)中提及巡警為求業績不擇手段：「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

---

46 在呂赫若〈牛車〉、自滔〈失敗〉、楊守愚〈罰〉、〈顛倒死〉、〈十字街頭〉、柳塘〈轉途〉、虛谷〈無處申冤〉、李泰國〈可憐的朋友〉、〈細雨靡靡的一天〉、賴和〈一桿秤仔〉等小說中，皆有日本警察威嚴又凶惡的行為，不管是取締攤販或車夫，這些底層勞動者在日本的天年裏，一個個都像待宰的羔羊，無法逃脫屠夫的魔掌。

47 張恆豪：〈蒼茫的時代觀照〉，《台灣作家全集・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集》，前衛出版，台北，1991年2月初版，頁14。另可參看〈警察王國治下的悲話〉《台灣民報》第一六十號，1927年6月5日。

48 參看《台灣民報》〈警察蹂躪選舉權-保甲無用論的一證〉、〈警吏侮視保正〉第一百廿九號1926年10月31日、〈濫用違警例處罰良民〉第一百卅號，1926年11月7日、〈刑事濫用職權〉第一百四十三號1927年2月6日、〈保正還是難得做〉第一百五十八號，1927年5月22日等篇章可證。

49 孤峰〈流氓〉見《台灣新民報》第368-370號，1931年6月13、20、27日。今收錄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315-326。

50 楊守愚〈瑞生〉見《台灣新民報》，第404-6號，1932年(昭和七年)2月27、3月5、12日，發表時用筆名靜香軒主人。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群失業的人》，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93-114。

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則、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51] 由此可見，警察的執法有時是自由心證的，對於底層勞動者多所橫暴，稍有反抗則拳打腳踢，悍然取締，一方面為了業績，一方面仗勢欺人、濫用公權力。

楊守愚〈罰〉[52](1932)中，一日巡警、偵探一同坐夜車，由於此方與彼方的台車皆未點夜燈而發生擦撞，但巡警這方一味苛責對方老車夫的不是，而無視自己縱容己方的車子不用點燈載客。所謂的官廳規矩：「太陽下山，車子就該上燈」的法只適用於下層他者。類似的情形在報刊上亦屢見不鮮，警察狂暴無視人權，令人想起傅柯的權力論述，掌握權力的人即掌握了知識。是故官大學問大，大人說的都是金科玉律，勞動者都必須奉為規臬！

更有甚者，日據時期的警察不乏斂財、貪色之徒，實令人髮指。1923年《台灣民報》第一卷第十一期的雜錄中，即載有〈巡查姦淫人家婦女〉一文，提及「有警察權之巡查，利用職權，姦淫人民婦女，居監督的地位，每置之不問、至釀成大問題，始以轉勤塞責」[53]。此類情形在陳虛谷〈無處申冤〉(1928)中即可見，巡警岡平從他地轉勤至此地，總時時帶著佩劍依心情宰制下層民眾，這把日人的權力之劍，彷彿挾帶著日本天皇的權力，使巡警岡平得以濫用特權，欺負地方小工的女兒：「她(不碟)也應該把她的肉體獻給我(日本巡警岡平)才是。我是優秀的民族，又是現任的地方官，這管內誰的勢力會壓倒

51 賴和〈一桿秤仔〉《台灣民報》第92~93號，1926年2月4日、21日。現收錄於《賴和全集》小說卷，前衛，台北，2000年6月，頁43-56。

52 楊守愚〈罰〉《台灣新民報》第402-403號，1932年2月13、14日。發表時用筆名翔。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群失業的人》，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185-194。

53 《台灣民報》第一卷第十一期，1923年11月21日。

我呢？」[54] 他常對人民道：「我們做官人，便是打死了人，也算不得什麼……你們若嫌我們政治不好，統統返回支那好啦。」[55] 日本巡警岡平如此的矮化台灣人，以殖民者盛氣凌人的睥睨姿態欺侮台灣本島人，仗勢欺人的公然壓迫，完全無視公理正義的存在。

陳虛谷〈他發財了〉(1928)一文中的巡查，藉著過年過節、生子大收禮金，行斂財之道，甚至利用地方保甲為其奔走發送御令：

> 巡查大人之夫人，昨夜產下一男，真是弄璋之喜，要請你於六日正午來飲喜酒，專此通知。
>
> ○○保正殿[56] (日語，即敬啟)

表面上看似禮貌性的宴請大家，實則強制性的要求民眾繳納禮金，藉以大發橫財。同樣的，牛車夫若不懂巴結的文化，巡查就可藉口道路損壞，禁止牛車通行四至七天不等，使車夫無法營生，又無法提出告訴。巡查如此惡劣的習性，在陳哮雞之口道出：「這個人(即巡查)，聽說極小見(即小氣)，要是兩塊錢不愿意了，他就隨時報應你」[57] 所謂人民的褓姆在此已完全無法等同聯想，巡查如此斂財的行徑與搶錢的強盜有何異？一向抓強盜懲治罪犯的警察，如今成為重大的罪犯時，那麼表示社會病了；當多數人們因失業身無分文，需藉由犯罪被處「廿九工」，才得以進入衙門內吃免費的三餐、吃到白米飯時，社會就真的病入膏肓了。孤峰〈流氓〉中一位失業的遊民，回憶失業兩年

54 虛谷，〈無處申冤〉(一)《台灣民報》第213號，1928年6月17日。今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23-242。

55 虛谷，〈無處申冤〉(三)《台灣民報》第215號，1928年7月1日。今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23-242。

56 一村〈他發財了〉(中)，《台灣民報》第二百三號，1928年4月8日。今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45-259。

57 一村〈他發財了〉(下)，《台灣民報》第二百四號，1928年4月15日。今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桿秤仔》，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245-259。

來，一日得以吃三頓飯的只有二十九天，而這二十九天卻是因為抗議警察，喊了聲「橫暴」！孤峰以極其反諷的方式來描寫殖民社會的病態，服從法令者每每不得溫飽，而反抗者竟換來了監獄中白花花的米飯，這樣的結果，應是執政者所始料未及的。

日本政權以亞洲勝利者之姿佔領台灣，在執行統治台灣人的方針上，仍以優越的日本皇民自居，將台島人視為次於日本人的下等人，實行各種差別待遇。因此自馬關條約割台之後，台灣的勞動者不僅受封建社會的戕害，又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式統治，台灣社會在經濟資本主義與警察政治的雙重支配掌控下，原有的社會生態結構早已破壞殆盡。

我們從小說中，看到一個個臉色蒼白、身形瘦弱的勞動者，羸弱且無反擊能力，猶疑徬徨在十字路口，行起路來不勝困倦，兩隻眼睛卻又偶露凶光。面對這一群貪贓枉法，斂財貪色的統治者，以及傳統封建思維殘留的本土資本家[58]，人民唯有自覺對抗，才能使社會免於永遠被黑暗籠罩，才能避免在日帝資本支配的網絡裏徬徨無助。一如蔣渭水〈勞動節歌〉所描述：「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推我熱血為他犧牲/要把非理制度一切消除盡淨/記取五月一日良辰」[59]。

四、覺醒與抗爭

面對階級的壓迫，勞動者從普通人成為勞工，進而發覺自己是下層的工人，而意識到自己做為工人的階級，一步步的由懵懂疑惑進而逐漸覺醒抗爭。

---

58 當時台灣林本源、顏雲年、辜顯榮、陳中和等大家族出資會社的情形，可參見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版，台北，第177表，頁400-401。由關係者一欄中可知與日資結合的情形。

59 蔣渭水所詞〈勞動節歌〉，轉引自楊碧川，《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稻鄉出版社，1996年6月再版，頁212。

在楊守愚〈元宵〉一文中，宗澤為自己與終年勞苦卻不得溫飽的農工憤憤不平，他深切感受農工兄弟的付出，遭遇強權者的欺壓，因此反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不斷滋長漫延。在日本強勢的壓境下，鄭登山〈恭喜〉中主角看清了貧富懸殊、民族差別待遇，以及『生產的後備軍』的苦楚，民族與階級意識覺醒。這兩篇小說都體現了勞工在歷經滄桑後，內心痲痺意識的甦醒，與自覺意識的萌發，仍未有實質的反抗行動。但正是意識的覺醒，才能引發革命成功的可能，一如楊華在〈黑潮集〉第二四首中所描述「只要是新生的火，她便能燃起已死的灰燼。」[60]

(一)、個人行動

生產工具的改變，使得多數出賣勞力的民眾失去工作，只好不斷的在各地尋覓工作。楊守愚〈一群失業的人〉[61] (1931)中一群四處漂泊的失業勞動者，跑了一百餘里路，三十多個村落，然而需要工人的竟少之又少，好不容易當了兩天的茶工賺了點錢，卻再也找不著工作，加上一路上旅費的花用，早已無剩餘的吃飯錢，饑寒交迫之下，去挖田裏蕃薯想充饑又被發現，驚恐的努力奔逃，不僅蕃薯沒偷著，也丟了隨身的包袱。日據時期這一群努力找尋出路的工人，社會無法給予他們上進的機會，徒勞的由家鄉出走，最後仍舊是不斷在各地流浪、奔走。

然而在群聚失業者的街頭，反抗因子已不斷茲生萌芽。世界是不會永遠黑暗的，日據時期勞動者面對執法者的欺壓與資本家的凌虐，已使得勞動者無法承受負荷，太多的規約與限制，太多的剝削與強取，使得勞動者們求生無

60 楊華〈黑潮集〉第二四首，原載於《台灣新文學》第2卷第2、3號，1937年1月31日、3月6日出版。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96。

61 守愚〈一群失業的人〉《台灣新民報》第360-362號，1931年4月18日、25日、5月2日。今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一群失業的人》，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39-52。

門、動輒則得咎，順著態勢有著官逼民反的趨向。

張慶堂〈鮮血〉(1935)中，九七本為佃農，因無法繳納鐵租而改換工作，至B市當人力車夫，一日載著大肚皮商人過崎(坡)時，好不容易推上崎頂，下坡時九七未能遵守規矩(在十字路口遵照警察的指示，等待自動車離去方可走過)撞上自動車而血染道路，這應是九七被壓迫至極點且氣力放盡所導致的傷害。但亦可能隱含著作者有意識的安排，假藉九七的無力煞車，來對抗執法者的權威，並趁勢使肥胖的資本家流血落地，以反日帝政權、反資本主義。雖然車夫九七流下鮮血，但這鮮血亦帶來了無限的希望：「整個的宇宙，仍然是被黑暗緊緊地罩著。但是，太陽不久就會出來了，這黑暗的宇宙，不是永久會這樣黑暗的，它總有變為光明的時候呢。」[62] 日本天年裏大地雖是一遍黑暗，九七個人式的流血抗爭，雖不足以改變社會整體，但已使反抗之光透出地表。

(二)、集體抗爭

縱使資本家、統治者不能設身處地的為勞動者著想，下層民眾當可將心比心的同情合作。楊守愚的小說〈瑞生〉，勞動者因自己處境的凄苦，也會適時地以同理心來對待他人。小說中勞動者瑞生在極度饑餓之時，拿出口袋中借來的一角吃了三碗三錢的燒麵羹，付帳時才發現是一枚膺幣，在不知所措且眾人圍觀的窘境中，一位中年的勞動者適時的伸出援手，代還了那九錢，雖是舉手之勞，卻足以使瑞生免於抓去警局。

回顧歷史，「一九二0年代初期，由於物價騰貴、生活不安而發生過初步的、自發性的工潮，但從一九二六年前後開始，發動了要求糾正與日本工人的

62 張慶堂〈鮮血〉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九號，1935年9月24日出版。轉引自《台灣作家全集-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集》，前衛，台北，1991年2月1日初版第一刷，頁107-134。

工資待遇及勞動條件的差別等有組織的工潮。」[63]底層勞動階級因為生活困苦，受壓迫甚深，所以容易反思覺醒，進而彼此團結合作，走上民族解放運動。

楊逵〈送報伕〉中，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政權統治下，過著如牛馬般的生活，農村因製糖會社的收購土地，許多勞動者已找不著出路。楊君於是立志赴日本期能改變現狀。在日本好不容易覓得派報所的工作，卻不幸被老板欺騙逐出派報所。此時日人田中與社會主義者伊藤邀約，楊君便參與工人運動致力於社會改革。文中被壓榨的送報伕，反對資方勞力榨取，經由集體合作的抗爭，終於懲治了派報所的老板，改善了原本派報所的不良環境，並掙回了工人的自尊。楊君於此彷彿找到了抗爭的妙方，強調工運以及工人團結的積極面，只要群眾共同合作抗爭，將可改善工人的生活。

〈送報伕〉小說有著很深的作者自況味道，從1924年楊逵赴日至1927年返台期間，他在日本亦擔任過送報伕，參與了東京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東京台灣青年會，並研究馬克思主義。1927年因為島內社會運動團體催促，未能完成學業即返台參與台灣社會運動。就如同文本中滿懷信心回台的楊君，以勞動群眾的罷工行動為勝利的契機，期能將日本習得的社會改革方式，用以拯救台灣苦難中的家鄉人。

群眾若要團結，首重市民意識的形成，在失業勞動者最安適的逃亡地--遊民群聚的公園中，反抗性的階級鬥爭正在醞釀，市民階級意識亦在公共領域裏逐漸形構。哈貝瑪斯(J. Haberams)有關公共領域概念為：

> 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份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公民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因此這種行動具有這樣的保障，即他們可自由地集合和組

63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版，台北，頁430。

合，可以自由地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64]

孤峰〈流氓〉中原為印刷工人的阿B，因經濟不景氣失業成為遊民，淪落到遊民聚集之地(市郊外的公園)，公園充滿著生機的草木受過春風的洗禮，並不排拒這一群心情落入黑暗谷底的失業者。在這開放的公眾空間裏，失業的勞動者一方面逃脫家人與社會的歧視，一方面彼此互相傾吐己身的遭遇，交換所得知的新訊息，並逐漸形成批判資本家的公共論述。作者孤峰以代言者的身分如是表示：

> 在這資本主義沒落的第三期，資本階級一切所負的虧損必然地是要移嫁於無產階級的肩上的，就是最近工場閉鎖，賃金降減，時間延長，大眾的解雇等的波浪，既是風靡了全世界，全世界和他們同運命的人，達二千萬以上，免講是被趕出工場來的…[65]

從「資本主義沒落的第三期」等文字[66]中，可證諸當時「以共產國際為首的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論斷的：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入最後崩解的「第三期」，也反映出作者反資本主義的意識。

文協分裂後，左派群起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打倒資本家而奮鬥。在勞動者心中，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是一切弊端的根源，在全球經濟恐慌的局勢中，唯有對抗資本主義才能有生存的餘地。小說結尾在一聲聲「資本家，乞家，搶人，資本家！」「所以非把他們打倒…」「著著！打倒打倒！」的群眾呼聲中，勞動者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已覺醒，反動的氛圍亦漸漸漫延，群體

---

64 尤根・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文化與公共性》，三聯出版社，中國北京，1997年，頁125。

65 孤峰，〈流氓〉，《台灣新民報》，1931年6月12、13、27日，第368-370號

66 遠景出版社1997年7月三版的《台灣文學全集》所轉載的孤峰〈流氓〉，在136頁的地方，將原文「資本主義」改為「XX主義」，亦是戰前、戰後白色恐怖所造成的特殊現象。

階級的抗爭亦蓄勢待發。

群體抗爭的訴求，在林克夫〈阿枝的故事〉中有所著墨，印刷工阿九與阿生面對老工人阿枝的景況，期待能藉由同盟罷工來為工人爭取福利：「在憂愁與恐怖統治著這小小的天地時…我們唯一的武器，就是同盟罷工」[67] 正如自滔〈失敗〉(1932)一文，也描寫到工人合群與抱平的社會抗爭意圖，力圖加入工會組織共同為勞動者奮鬥：「抱平本來在困窮生活的當中，早就意識地加入在工會裡，以至於文協的團體了，他是愈愈身受或目擊著，那賤賣勞動力的人們，精力的疲憊，面目的焦黃，和現在一般窮小販的被捕捉、刑罰，這使他越發深一層地，感到被掠奪者共同悲哀！」[68] 小說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與1920年代後台灣社會無數的罷工風潮一般，象徵著群眾意識的團結。正如楊華在〈黑潮集〉第三二首所強調的團結性：「我們是燎原之火底絲絲，祇要我們將這些絲絲的火線集攏起來，就可燒斷束縛自由的繩索！」[69] 與社會主義的理念如出一轍，都在在肯定勞工團結的重要，不管是什麼工人組織或是同盟罷工等社會運動，都是合作改進勞動生活的重要途徑。

當然執政者面對勞動者的反抗行動，勢必有其應對措施，但治本的解決問題者少，治標的壓制卻是屢見不鮮。點人(朱點人)的〈島都〉(1932)中提及工運所面臨的困境，小說的主角史明是鐵工所的工人，也是勞動者的兒子，在世界思潮的洗禮下，覺醒到工人所以窮苦的原因，走向社會運動的第一線戮力於工運。然而卻遭受挫敗，因為「法律的權威，金錢的力量，竟超越在一

67 克夫(林金田)，〈阿枝的故事〉，《台灣新民報》，1931年(昭和六年)10月3、10、17日，第384-6號。此處引用第386號。

68 自滔，〈失敗〉，《南音》，1卷12號，1932年2月3日。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豚》，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85。

69 楊華〈黑潮集〉第32首，原載於《台灣新文學》第2卷第2、3號，1937年1月31日、3月6日出版。轉引自《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三版，頁98。

切之上，只一接觸，史明便被捕虜。」[70] 由此可見統治者對社會運動的壓制是無所不在的，政府律法的箝制或金錢收買的行動屢見不鮮，成為組織工會的阻礙。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同盟陣線中暗地出賣情報的爪牙，陳賜文〈其山哥〉(1932)一文中，一群想改革社會的勞動者力圖組織工會，不僅受到會社的壓制，更受到趨炎附勢的「爪牙」阻撓：「會社不承認(工會)，那幾個代表也被開除了，有幾人還被官廳拘留著，本來會裡也要派人來看你(其山哥)的病，但是會社也派不少『爪牙』，怕被他們看見，有影響著你所應得的手當(日語：薪津)，所以單叫我來。…被他們認做不良職工的人，總會一起被裁去，不過他們現在先在改正服務規程，待這規程改好，便會裁員了。」[71] 聽說這個服務規程的第一點，就是退職「手當」的規定，即「怠過業的人」(罷工過的人)將不發給退休津貼。製糖會社如此明文定法來箝制罷工行動，可謂專制獨裁，以法來建立其控管空間，限制工人的民主自由，不准勞動者反抗，就算抗爭亦不會讓勞動者成功。類似的情形若與林克夫〈失業的時代〉(1931)一詩相互參照，將可發現在失業的年代工人的工作是沒有保障的：「一群群的勞動者，/洪水般地，/從工場裏，洶湧出去！/是不是回家休息?/是，是讓他們永遠地…/因廠主已把他們開除！」「這失業的年代喲！/兇狠！/猙獰！/時時刻刻地，總想虐弄勞動者的運命。」[72] 針對勞動者的罷工，資本家甚至可以予以永遠的開除！

但抗爭的失敗仍有其意義。林努進〈牛車夫〉(1931)一文中，印度牛車夫雖受壓迫，但勇於公然向統治者示威，最後雖因違法遭逮捕死在『鐵丸』下，但群眾英雄式的歡送，卻使車夫的入獄，成為從容就義、捨生取義的豪情壯舉：

---

70 點人，〈島都〉，《台灣新民報》，400-403號，1932年1月31日、2月6、13、20日。
71 陳賜文，〈其山哥〉，《台灣新民報》408-410號，1932年3月26日、4月2日、4月9日。
72 林克夫(林金田)〈失業的時代〉《台灣新民報》第372號，1931年7月11日。

門外的群眾，唱著悲壯的勝利歌，歡送那些慷慨的英雄們進監。八打雲於將別歡送者時，高唱印度的國歌，一種悠悠揚揚的音調，使漲破耳膜的喧嘩，暫歸默靜。[73]

統治者制定法令的支配權，在其執行刑法時，早已被圍在四周的群眾聲音給解消了。正如賴和等人1923年因治警事件被捕，出獄時賴和看到許多迎接者所寫下的詩作〈出獄歸家〉：「莽莽乾坤舉目非，此身拼與世相違，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74]一如傅柯(Michel Focuault 1926~1984)對於古代刑罰的比擬，「微觀權力」(mikroskopischen Macht)[75]的形成也促使了君主制度的瓦解。所以面對統治者或資本家的欺壓，群眾的合作抗爭仍有其正面積極意義，因為各方群眾投以執政者的不滿，已使得掌權者的合理、合法性動搖瓦解。

所以，不管在日本或印度或世界各地，權力者的支配力都可借由群眾的反作用力來加以抵消。群眾可在主流霸權的論述空間結構裏，建立屬於勞動者的組織與空間，來一一擊破執政者所形塑的牢籠，進而求取正當而自然的生活環境。

---

73 林芳進，〈牛車夫〉，《台灣新民報》，第384-5號，1931年10月3、10日。

74 賴和〈出獄歸家〉，轉引自《賴和全集(一) 小說卷》，前衛出版社，2000年，台北。

75 訴諸群眾的「大觀」式刑罰技術，中外皆然。近年法人傅柯(Foucault)對此曾加以理論化。他提醒我們，「大觀」式刑罰有其隱憂。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眾，對權力當局形成一挑釁的微觀權力。參詳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pp24~95.轉引自王德威，《小說中國》，麥田出版社，台北，1996年初版三刷，頁18。

結 語

考察日據時期的勞工文學，在面臨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與台灣話文論爭的文學風潮中，強調中國白話文的林克夫、朱點人與主張台灣話文的楊守愚、賴和、蔡秋桐等，在撰寫勞動者的生活樣貌時，都不分你我的站在同一陣線，成為勇於筆伐社會弊病的作家，有時雖不免教條式的控訴與聲嘶力竭的吶喊，但能在日人執政的監控下，不畏強權的寫下日據時期的扭曲歷史，亦令人感佩。

從楊守愚發表的作品〈一群失業的人〉、〈元宵〉、〈赤土與鮮血〉、〈凶年不免於死亡〉、〈誰害了她〉、〈一個晚上〉、〈瑞生〉、〈人力車夫的吶喊〉、〈一作車夫〉、〈女性悲曲〉、〈長工歌〉等等作品觀之，可以說楊守愚是當時勞工文學作品量較豐的一位。而1927年被捕入獄的楊華，主要作品包含獄中撰寫的新詩《黑潮集》五十三首，與〈一個勞動者的死〉、〈薄命〉兩篇小說，雖數量不多，卻是勞工文學的有力之作。至於曾參加台灣文藝協會、台灣文藝聯盟活動的朱點人，由於生於都市、長於都市，〈島都〉、〈脫穎〉等小說關懷之對象也以工人、庶民階層為主。與楊守愚同樣參加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王詩琅，在黑色聯盟案豫審終結中是最後四名被起訴的，[76] 他重視工人階級的表現，在〈沒落〉、〈十字路〉等小說中，以社會主義傾向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來求得工人的解放。身兼製糖會社原料委員的蔡秋桐，則對於蔗糖農工的掌握有著較他人更深入的描繪。

整體分析日治時期勞工形象，從壓迫面來看，因為舊社會的體制仍存留，因此日治時期的勞工仍受到封建體制的遺毒，且由農業到工業社會的轉型過渡，生產工具的改變造成勞動的異化，加之日本殖民政權領台夾帶著資本主義

76〈黑色聯盟案豫審終結四名被起訴〉《台灣民報》第一百八十一號，1927年11月6日。

的壓榨，使勞動者異化更深。在社會階級分明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階級區分日益嚴密，[77] 底層勞工階級是居於最劣勢的受欺壓者，受到的壓榨相較於封建社會依然不變，甚至益形嚴重。如傳統封建制度下的勞工，原為社會身份位階極為受壓迫的階層，但在日本殖民體制入侵下，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使得勞工在不斷失業與轉業的生活中，不僅是殖民地裏的被殖民者，亦是大和民族種族歧視下的他者，更在本土資產階級與殖民政權勾結共同欺壓下，成為受資本家控制下的工人，成為多重受壓迫的台灣勞工。是故不管時代如何朝現代化前進，不變的是勞動者依然受到壓迫，只是欺壓的形式不同罷了。

就反抗方面來看，在一半是帝國殖民、一半是封建的社會形態下，文學作品在論述基調上除呈顯出反封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意涵外，在罷工的文字裏我們看出作者解放勞工階層的主張。參照當時的社會運動，是由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轉化到無產者運動的，其中包含著民族性的抗爭與階級性的對抗。就小說文本觀之，個人式的抗爭有著官逼民反的不得不成份，且多為悲劇收場，仍無法改變既存現狀；唯有群體合作的社會運動，才能稍解勞動者的困境，才能以傅柯所謂「微觀權力」的群眾反作用力去對抗統治者的獨裁政權，並一一解消欺壓者的支配力。

日治時代台灣的勞工問題之作，多集中於1930年代前後，正好如實反映1930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局勢。當時馬克斯思想於日本蓬勃發展，普羅文學也隨之興盛，留學日本或蟄居台島的知識分子難免受其影響，其熱心社會科學者，大致衍生如下結論：「工業革命成功，使得資本主義興起，資本主義者又

77 出現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的資產階級、進步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自耕農、貧農及農村工人、以及工人階級等。」參見陳芳明《殖民地台灣》，麥田出版社，台北，1998年10月1日初版，頁65。

以帝國主義為武器，攫取殖民地的經濟資源，再製成商品向殖民地傾銷，造成殖民地大量人口失業，也因此連帝國主義者都要自食惡果；因為商品滯銷，帝國主義國家失業人口遂亦激增。當時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飽受資本家之榨取戕摩，而日本國內也發生嚴重的失業及剝削情形。於是轉而關注超越民族立場的階級問題，左傾之後的文化協會，更是積極推動農工運動及學生運動，於是勞資糾紛、租佃爭議、罷工事件相繼而起。」[78] 相較於五四勞工文學，這些作品亦有著「沒有勞動，就沒有世界」[79] 的思維模式，勞動者是社會的小螺絲釘，沒有勞動者的創造努力，資本家就不能坐享其成，國家政策就不能具體實踐，是故階層雖低，卻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石，角色雖是渺小，但人性尊嚴不容踐踏。

在1937年代後，真正體現台灣勞工文學特色的寫實之作極少，因為台灣勞工文學的主體性已喪失，代之而起的日本強權政策監看下的扭曲之作。因為日據時期的反抗鬥爭在1937年7月7日因中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戰時體制而被箝制，各地居民被強迫編組成立所謂「勞務奉公隊」派往各工程地，作沒有報酬的「奉仕之作業」、或徵召成為志願兵，或被派遣至日本造飛機。[80] 文學作家亦加入戰爭的協力團體，如呂赫若〈風頭水尾〉(1945)[81]、楊逵〈增產之背後-老丑角故事〉[82] (1944)等，其中〈增產之背後－老丑角故事〉即是應台灣總督府情報課之邀，至石底炭坑觀察煤礦工人的生活，目的是實地參觀

78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5年2月初版，頁448-450。

79 張鴻聲，〈從人道主義到社會主義－論「五四」勞工文學〉，《鄭州大學學報》，第30卷第5期，1997年9月，頁13-19。

80 參見陳碧奎，《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前衛出版社，1998年，台北。

81 《台灣時報》27卷第8期，後收錄於《決戰台灣小說集》。現前衛出版社收錄。

82 楊逵〈增產之背後-老丑角故事〉原載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的《台灣文藝》1卷4號，轉引自彭小妍編《楊逵全集》第八卷・小說卷(V)，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台南，2000年12月，頁49-88。

戰時體制，以撰寫出呼應日本帝國主義南進政策的「報告文學」。因是「應邀」之作，文末讚揚佐藤金太郎的精神是「美麗的日本精神的萌芽」以及寫著「煤的增產是國家的需要」等文字，亦回應著邀請者的要求，這可說是楊逵的虛應之作，內容自令人質疑。此外一向創作豐沛的楊守愚，亦在1937年總督府廢止漢文後，轉向舊詩詞的寫作，與賴和、陳虛谷等人於彰化成立漢詩社「應社」，成為創社會員。[83]

是故日本帝國戴上吉江喬松的覬覦眼光看著台灣，以天皇之姿治理台灣，憑藉其政治優勢實行警察政治，以新建設的美名夾帶資本利益的謀取，任意訂法來限制監督台灣人民，更肆無忌殫的搾取台灣勞動工人的剩餘價值，使日治時期的本土勞動者在歧視與差別待遇中，淪為日本「脫亞入歐」[84]的東方主義共犯結構下的他者，這正與一貫寫實的賴和撰寫的〈南國哀歌〉一詩形成強烈對比：

兄弟們到這樣的時候，
還有我們生的樂趣？
生的糧食儘管豐富，
容得我們自由獵取？
已闢農場已築家室，
容得我們耕種居住？
刀鎗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
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

83 詳參《台灣作家全集-楊守愚集》前衛出版社，台北，1991年2月1日初版，頁11。

84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論》(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刷館出版，1959年4月第一版)中闡明日本文化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的方針。另外龍應台《百年思索》(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版，頁49。) 亦提及福澤諭吉一八八五年的《脫亞論》，他提出的「脫亞入歐」論，即在脫亞洲的固陋，轉向西方文明。主張「我們不要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這一隊伍，與西方文明共進退；對於中國和朝鮮，也應像西方人對待中國和朝鮮那樣地來對付」。

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85]

這一首台語詩，充分的體現出日治時期台灣勞動者生之樣貌，將日本編織的美麗謊言一一粉碎。在留存下來的小說裏，許多的勞動者因綺麗的夢想由鄉村到都市謀生，以都市為生活的新契機，然而在革新與美化市容等新建設的背後，正是日本以現代文明欺矇台灣人的合理合法之道，農人與工人並沒有因現代化的到來而獲得生活水準的提昇，徒使底層勞工陷於經濟窘境，甚至瀕臨死亡，而文學批判的力量亦在此彰顯出來。

大體而言，日治時期所有述及勞動者的文本以寫實居多，文字或許並不華麗流暢，但卻是一篇篇血淚的見證，具有鮮明的社會意識，使我們在數十年後的現在，能拆穿官方歷史記載的蒙蔽與欺罔。然而所見的勞動文學中，幾乎看不見快樂勞工的身影，卻總嗅出勞動者現實生活的苦痛味，在殖民者壓榨、掠奪的欺凌下，最終只能在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結構下，成為國際鬥爭中的小工兵、世界底層賴以為用卻又非常低賤的廉價勞工。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日本殖民者再現西方式的東方主義的凝視下，潛藏著不公不義的歧視與刻版印象，台灣底層傭工成為被剝削、壓迫的弱勢族群，只有在日人權威的指揮棒下，在經濟、市場、資源或各方面不合協的協奏著，一如小小受控的傀儡，是總督府棋下的小工兵，得在日人鼻息下，以日本為中心，被動的接受著統治。他們的處境一如統治階層戮力培育的向日葵，隨著疾風厲政而生長發展，在日本淫威的風中，飄搖擺盪，而最終仍表現了他們頑強的生命。

---

85 賴和〈南國哀歌〉《台灣新民報》第361、362號，1931年4月25日、5月2日。現收於《台灣文學全集・亂都之戀》，遠景出版社，台北，1997年7月，頁139-144。